

唐代中央对藩镇控制问题研究综述

刘兴云

(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南阳 473061)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又延续了150多年的统治,其时间长短堪比“安史之乱”爆发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中央对藩镇的有效控制就是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唐后期中央是如何控制藩镇的?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宋强刚《唐代藩镇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已从藩镇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张佐良《近三十年来的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2期)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阐述。本文主要从唐代中央对藩镇控制的角度,对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作一回顾。

一、综论

对唐中央控制藩镇的措施进行宏观概括,探讨唐后期中央集权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从进奏院的设立、宦官监军、藩镇相互制约诸方面分析唐后期中央对藩镇的控制。他认为,进奏院的设立,适应了唐后朝廷政令贯彻上的特殊需要,监军网的设置,使唐廷能够长期成功地控制着绝大多数藩镇,尤其是南方藩镇,加上藩镇的相互制约维持了唐中央政权一百多年。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认为安史之乱后,唐中央与地方关系转变为外重内轻。中央政权如何最有效地驾御地方政权,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王朝在国家结构形式方面一直在探索和实践的重大课题。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认为,唐后期注重从行政区划、军队制度、财政制度、财政使职诸方面加强对地方控制。刘后滨《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在唐宋体制变迁中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指出,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体制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对唐宋间政治形态和官僚形态的变化产生了影响。冯金忠《唐后期地方武官制度与唐宋历史变革》(《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认为唐后期中央成立了以神策军为代表的禁军,以图与藩镇地方力量相对抗,同时分割藩镇巡属,限制藩镇对支郡的控制,扩大支郡的独立性。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已经在潜滋暗长地发生着某种变化,只不过当时正处于酝酿阶段,并不明显而已。王凤关翔《唐代西北藩镇与地域社会》(《唐都学刊》2010年5期)认为,唐朝廷为加强京师的安全,在京西北设立诸镇,唐中央在政治经济上给他们以优待的同时,又对京西北藩镇采取了极为复杂的控制措施:首先在节帅的选用上务必“先求易制”,其次是禁军监控,再次是坚决不姑息西北藩镇的叛乱。

二、专论

1. 政治方面。关于中央与道、州关系的研究。张国刚《唐代藩镇的历史真相》(《文史知识》1986年第9期)认为,唐代藩镇称作“道”,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版,1999年再版)也认为,在行政地理方面,唐代中后期出现道、州、县三级制。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新解》(《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认为,唐代后期朝廷、藩镇、州之间,存在虚实结合的“三角关系”,地方实行“二级制”而非“三级制”。藩镇的正式行政区划性质,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唐代法律中得以确认,而朝廷与州的上通下达关系却时时被强调。藩镇若与朝廷对抗,则竭力控制属州;朝廷若要削弱藩镇,则促使与州的直达。唐代后期至北宋初期,藩镇与州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即藩镇渐弱而州渐强。吴丽娱《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司、客将与客省》(《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认为,唐后期五代,中央和地方都有接待四方来使的礼仪机构和官员。在中央是客省和客省使,在地方则是客司与客将。中央的客省和客省使主要负责藩镇地方派至朝廷的人事往来;而客司和客将赞导藩镇礼仪,接待朝廷及他镇来使,其职一同于中央的客省和客省使。贾玉英《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变迁论略》(《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认为,外宰相名号制度是唐后期以来藩镇干预朝政的产物,它的演变体现了朝廷对节度使控制政策的变化。樊文礼《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代宗朝的藩镇政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认为,代宗并不是一味对藩镇姑息,从制度层面也给予限制,如限制藩镇兵力,罢诸州团练、守捉使,敕令藩帅不得摄署州刺史。贾志刚《唐代地方长吏的交替代》(《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认为,唐朝廷确立的方镇留后、州府知州负责与新旧任递相交割的办法,既有考核的动机,也有干预地方长吏交替代的用意,更有控制地方的意图。王玉群、谷立新《试论节度使为晚唐中枢的一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指出,一般认为藩镇节度使是军政合一的地方长官,不能直接参与中枢事务。但事实却是,强大的藩镇节度使拥有挟制、控制或生杀皇帝以及作为皇帝机要秘书的枢密使、翰林学士和作为最高军事首长的神策军中尉的能力和手段,从而成为晚唐中枢起主宰作用的一种势力。这一过程是从僖宗中和元年开始的。夏炎《从州级官员设置的变动看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通过刺史品阶的变动、别驾的置废、地方增员与中央减员的矛盾三个视角考察了唐代州级官员品阶、职位、员额设置的变动情况,进而探讨了在这些变动因素的背后所体现的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相关文章还有夏炎的《唐代藩镇问题再认识——以藩镇与州的关系为中心》(《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关于宦官对唐后期政局影响方面的研究。贾艳红《试谈唐中后期的内诸使司》(《齐鲁学刊》1997年第4期)认为唐中后期通过设立内诸司使,使宦官掌握了军政大权,从而有效地控制了诸王、大臣、将帅、外戚等人的颠覆活动,巩固了皇权。王守栋《试论宦官对维系唐中后期统治的作用》(《德州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唐中后期的宦官对监视朝臣,控制藩镇,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政权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的《论唐中后期的“二元”制衡机制》(《江汉论坛》2008年第9期)指出,宦官作为维护皇权的政治势力,在唐中后期迅速膨胀,成

为内挟朝臣,外制藩镇的新的制衡机制,即宦官枢密使、神策军中尉制约外朝宰相,宦官监军使制约藩镇节帅的“二元”制衡机制,这种机制维系了唐中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

关于公主、藩镇婚姻及质子制度的研究。唐中后期,中央不断将公主下嫁藩镇,并且令藩镇派质子入京,以图加强中央与藩镇的联系。贾艳红《略论唐代的政治婚姻及其作用》(《齐鲁学刊》2003年第4期)对唐政府与藩镇之间的政治婚姻进行论述。丛曙光《唐代婚姻类型浅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谈到皇室与藩镇的婚姻时指出,在中央对地方控驭能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唐进行采取与藩镇联姻的方式来加强与地方的联系,希望公主能成为维系中央与藩镇之间关系的纽带。王剑《另一种和亲——也谈中唐以后公主下嫁藩镇问题》(《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认为,唐代中晚期,内外交困,唐政府频繁地将公主下嫁给各藩镇,以求取国家内部的和平。但唐朝对各藩镇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最终以失败告终。王静《唐长安城中的节度使宅第——中晚唐中央与方镇关系的一个侧面》(《人文杂志》2006年第2期)从朝觐制度、节度使宅第、节度使家庙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后期节度使权力的消长以及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对长安社会的影响。金滢坤《论中晚唐河朔藩镇割据与联姻的关系——以义武军节度使陈君赏墓志铭为中心》(《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以陈君赏墓志铭为例来探讨藩镇割据与藩镇联姻问题,认为中晚唐藩镇内部、藩镇之间及藩镇与中央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指出联姻本质上不是藩镇联盟的终极目的和最有效的手段,但是联姻在特定的军事基础之上和历史背景下,对促进藩镇内部和藩镇之间的某种连衡,或者说联盟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是反映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政局关系的晴雨表。

2. 经济方面。唐后期,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从经济方面对藩镇进行控制。金宝祥《历史研究与理性思维》(《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认为杨炎大有以两税法为手段,来充实中央财政收入,建立一支强大的禁军,消灭宦官、藩镇这两大恶势力的气魄。黄永年《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也提出实施两税法的主要意图就在于从财政税收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矛盾。并认为两税法把以往的非法定敛并入两税,纳入中央的控制范围;中央没有确定全国统一的税率,改用摊派的办法;中央派人确定各州税额并划分其上供、送使、留州份额,这些新规定新措施,都反映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权之争。陈明光《论两税法与唐朝前后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通过对唐朝前后期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几个层面的对照分析,指出两税法中有关处置地方政府财权的内容,是对代宗朝削弱方镇财权政策的继承和总结;两税法改革包含着重建中央与地方分割赋税权益的新方式的现实意义。

祖大祥《唐代藩镇赏赐述论》(《人文杂志》1992年第2期)指出:“在唐廷军事力量虚弱的情况下,行赏赐,厚‘恩泽’,的确不失为笼络藩镇、加强朝廷对藩镇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吴丽娱《唐末五代的河东盐池与政权移替》(《春史卞麟锡停年纪念论丛》,2000年)分析了乾符以后,围绕老池盐池的归属,朝廷内部朝官与宦官之间、朝廷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和拼杀,得出了“对于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最终鹿死谁手”的结论。江晓敏《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南开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布,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

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央财政权力的下放,出现了中央财政地方化的倾向,这使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关研究还有吴丽娱的《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张卫东的《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以土贡为中心》(《江汉论坛》2007年第5期)等。

陈明光《唐朝中央对地方的财政监督述论》(《宁波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两税法颁布后,额外征收成为财政监察的主要内容,除了御史台的常规监察及御史官员的出巡之外,中央还派“出使郎官”和财政“三司监院”对地方进行监察。贾玉英《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指出,安史之乱以后,伴随赋役制度的改革,出使郎官、转运使、巡院等新的监察体制出现,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体制开始向固定型、多元化、多层面变革。相关研究还有宁欣的《唐朝巡院及其在唐后期监察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3. 军事方面。对藩镇形成的源头探索。胡宝华《唐代天宝年间军费开支蠡测》(《文史》第33辑)通过对天宝时期诸镇军费开支的比较,指出无论是供衣或是供粮,幽州节镇在待遇上均低于其他地区。而仅有幽州兵力三分之一的剑南节镇,却享受到与幽州数量完全相等的供给。作者推测这或许与天宝政局有一定的关系。陈明光、王敏《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分析》(《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认为,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的确在增长,但增长状况并不平衡,节度使行使权力受到中央的有力约束。唐中央通过频繁调动和限制兼统,有效防止绝大多数节度使专擅一方。安禄山的权力状况属于特例,其形成过程及发动叛乱有复杂的原因,不宜简单归结为当时节度使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唐刚卯《唐玄宗的斗鸡与开天朝政治——〈东城老父传读后之一〉》(《唐研究》第6卷)指出,玄宗好斗鸡,与其十二辰信仰及社会传统的阴阳学说有关,玄宗以宠信安禄山为掩护,却寄希望于隐秘地用“金鸡障”的荒谬方法来“压弭”安禄山。由于其对“压弭”法的迷信,未采取有效遏制安禄山势力的方法,促进了安史之乱的产生和及发展。夏炎《试论唐代都督府与州的关系》(《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认为,都督府与治所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都督府与治所州政府之间是合署办公的关系,两套僚属机构合并;另一种形式则是都督府与治所州存在着都督府官员与州级官员两套僚佐系统,这两套系统虽拥有一个长官,但并不是合署办公,而是相对独立,互不统属。都督府与其属州是上下级的统属关系。随着唐代都督府的名存实亡以及藩镇的崛起,都督府与属州之间的行政统属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弱,但是这种都督府统属数州的体制直接影响到唐后期的藩镇统属属州的体制。齐永锋《说神策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认为:“安史之乱后的新建禁军——神策军,是一支以宦官为统帅、由其完全控制的军队。它具有不同于其它军队的一系列特征,在中晚唐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黄寿成《唐代河北地区神策行营城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对唐穆宗时期乐寿、博野二县神策行营的设置与废弃进行了考察。其《唐肃宗时河朔方兵变事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认为,安史之乱后,参加平叛的唐军主力河东、朔方等军先后发生兵变,是中央与地方藩镇矛盾激化的表现,说明肃宗为首的中央已着手对地方藩镇的军队进行整饬,以防新的离心势力出现。但这种整饬最终以中央的妥协让步告终。夏炎《唐代刺史的军事职掌与州级军事职能》(《南开学报》2006年第4期)认为,在唐代的州级官员中,明

确具有与军事行动相关职掌的官员是刺史,州级具有一定的军事职能。唐代刺史的“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并非虚号,而是与刺史的军事职掌及州级的军事职能相符的。唐前期,刺史对州郡兵的军事权力有限,刺史对州郡兵有领兵权而无发兵权,普通州级对州郡兵的军事职能较弱,中央拥有对军事的绝对领导权力。唐后期,在藩镇长官兼治所州刺史的情况下,这些刺史拥有对州兵的绝对军权。属州刺史对州兵的权力也根据不同情况,而有强有弱。同时,刺史还参与府兵、镇兵、团结兵等兵种的管理和领导,并参与募兵。

对募兵制时期军费问题的探讨。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谈到了唐代的供军费用支出。贾志刚《唐肃代之际河西军费问题试探》(《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从肃、代时期河西供军方式来观察唐代军费制度的渐变过程。其《唐代军籍虚占与军费》(《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认为唐代军籍勘简趋向于军额限定,中唐以后,额内兵与额外兵并存,但军籍虚占、窜名挂籍、军功虚冒之风,普遍存在于各道诸军之中。军费漏洞愈益严重。这些现象导致唐廷财政亏空,进而成为国政之弊。唐政府采取的弥补措施软弱无力、不济于事。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对唐代军费与军籍、军赏、营田、甲仗、军市诸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并对唐代各相关道州军费问题作了具体考察。龚泽琪《唐王朝军事财政体制的变迁与国家的兴亡》(《军事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认为,唐王朝建立之始,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事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保障了军事需要,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使国家财政收支失衡,军队吃“皇粮”的基础被严重削弱,唐王朝由盛转衰。唐代末年,藩镇割据,中央政权军资供给奇缺,军事财政保障由统一被迫走向多元,军队吃“皇粮”制度彻底崩溃,唐王朝最终灭亡。

4. 民族关系。刘运承、周殿杰《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认为,藩镇割据是唐代民族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一股逆流,是李唐统治日益腐败的情况下,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只有当内附少数民族社会共同体被历史发展的洪流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时,藩镇割据才会失去其依恃的基石而最终销声匿迹。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民族出版社,2003年)及《唐朝中央王权的衰落:地方势力与民族势力的结合》(《民族史研究》2001年第4辑,民族出版社)探讨了晚唐中央与地方、地方势力与民族势力的结合等问题。

三、研究的不足

唐代中央与藩镇的关系是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唐代中央对藩镇的控制措施,对五代宋初的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有关唐后期中央对藩镇控制的研究,已涌现出不少成果,既有对具体时段、具体事件的微观探讨,也出现了某一角度的跨时段的系统考察,甚至把唐后期历史与五代两宋历史联系起来研究的趋势,而且在理论方法上,还将政治学引入唐代中央与藩镇的矛盾冲突研究中。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对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如唐中央对藩镇控制的政策措施、经济影响、军事布控和机构调整等诸多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仍有多方面影响因素值得去探讨和研究。再如对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的研究,由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国

很早就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唐代中后期出现藩镇,并非是分权制的产物,而是在唐代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等方面发生变化后,统治者未能洞悉时局变化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的结果。安史之乱后,唐政府一直在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努力。以往研究者多是从藩镇的视角看待唐中后期的历史,这样就模糊了唐中后期中央集权的强化轨迹。加强这一薄弱环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清唐五代宋中央集权国家发展的历史,为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增添更多内容。因此,更期待唐史工作者不断挖掘新史料,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凝练出更多新的见解来充实这一研究领域。

近二十年南汉史研究概述

张金铄

(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

南汉是五代时期割据岭南的地方政权。南汉割据对于五代局势演变以及岭南经济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南汉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已有专门介绍(见张金铄《本世纪以来南汉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2期)。之后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特别是南汉德陵、康陵的发掘,为研究南汉史提供不少新的资料。近20年来,发表相关论文就有近60篇,本文试对此研究进行总结。

一、政治史研究

南汉自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刘岩称帝,到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后主刘鋹被俘,凡割据55年。南汉前期政治稳定,开设科举、学校,重用士人,后期则宠任宦官,滥施淫威,赋税沉重,境内矛盾激化。学术研究集中在其政治兴衰、南汉君主以及宦官等方面。

关于南汉政治兴衰方面,张金铄发表《封州与岭南刘氏的兴起》(《岭南文史》1995年1期)和《南汉割据及其政治设施探析》(《合肥学院学报》2004年1期)两篇文章,前者考察封州的战略地位及其在南汉兴起过程所发挥的作用,后者考察政治设施,兼论其割据的各种因素。作者认为南汉是在中原动荡环境下割据的,中原局势稳定后,南汉就失去存在的基础。曾国富《士人的任废与南汉的兴衰》(《广东史志》1995年3期)以及张金铄《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社会科学家》2000年5期)考察南汉士人活动,南汉前期依靠北方南迁士人,建立政权和政治设施,这些对于岭南地区开发和政治稳定都起到积极作用,但后期疏远士大夫,重用宦官,导致政治腐败和国力衰落。曾国富《纸醉金迷兴王府——南汉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及其影响》(《湛江师院学报》2001年5期)考察南汉政治腐败及其社会危害。何浩灿《试论五代十国时